

※周策縱教授紀念專輯※

「白頭海外說《紅樓》」：
周策縱教授的曹紅學

王潤華*

一、白頭海外說《紅樓》：「多方」研究的新紅學計劃

我的老師周策縱教授(1916-2007)在《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出版時¹，序文特別提起，他在一九八一年訪問新加坡，當地學術與文化界以酒會招待，大家題詩寫字，新加坡著名詩人兼書法家潘受先生(1911-1999)曾寫贈下面一首詩幅：

是非聚訟苦悠悠，識曲端推顧曲周；能使一書天下重，白頭海外說《紅樓》。
潘受於詩後附註說：「策縱教授去年六月在美召集第一屆國際紅學會議，使《紅樓夢》一書之光燄如日中天，誠學術史上不朽之盛事。頃來新加坡，喜獲把晤，承索拙書，因綴二十八字奉博一笑……。」周教授非常喜歡潘受先生的贈詩，他還說：「潘公的詩書皆妙，這件條幅我至今還珍藏著。他說的『能使一書天下重』我自然不敢當。至於『白頭海外說《紅樓》』，倒相當合於事實，也會終身不忘的了。」²可見周策縱教授對潘受的詩句「能使一書天下重，白頭海外說《紅樓》」，感到知音相惜。因為《紅樓夢》的研究，對老師來說，確實不只是單單研究與發表論文而已，而是終生努力的學術人生大事業之一³。所以在序文中周老師感嘆地說：「我

* 王潤華，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¹ 周策縱：《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另有中國大陸的簡體字版：《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兩書所收篇章相同。本文引文引自前書。

² 周策縱：〈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xix。

³ 我個人對周老師比較清楚的其他學術人生大事業有幾個，如延續五四傳統的新詩的使命、發展從人文跨越學科的角度去研究中國人文學術，如《文林》的出版、從新整理出中國文學思想發

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本來定有比較頗具系統的完整計畫，可是一直未能實現。」⁴

周老師說，如果題詠也算紅學，至二〇〇〇年，他已參加紅學界七十年了。老師一九二九年（十三歲）起，就開始寫詠《紅》詩，後來又以白話題詠，至今還保存不少。出國前，他已很注意新紅學的研究方法了，尤其受顧頡剛的啟發特別大，不過老師發現至今紅學界的嚴重問題還是：「紅學家很少有人深刻研究過中外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四十年代中期我曾向顧頡剛先生提出一個問題：爲甚麼近代新《紅樓夢》研究都偏重在考證方面？他說那是對過去小說評點派和索隱派過於捕風捉影的一種反感，而且從胡適之先生以來，他們一批朋友又多半有點歷史癖和考據癖；當然，無論對這小說怎樣分析、解釋、與評估，總得以事實做根據，所以對事實考證就看得特別重要了。我也很同意這種看法，但同時覺得可惜過去紅學家很少有人深刻研究過中外的文學理論與批評。⁵

一九四八年五月老師前往美國留學，在船上幾十個留學生，別的小說不愛看，發現有人帶了一本《紅樓夢》，大家爭相閱讀。他說：「在這種艙外風濤，艙內悶熱，多人搶讀的緊張情勢下把這巨著又匆匆斷斷續續看過一遍，使我益發覺得紅學應該有新的發展，並且須在海外推廣。」⁶

初到紐約的五十年代，他與一批朋友成立了白馬社，以顧獻樑 (1914-1979) 在紐約市的公寓為中心，這個樓房裏裏外外，漆上朱紅色，周老師稱為「紐約紅樓」。當時住在紐約的胡適 (1891-1962) 也參與活動並給與鼓勵，因為他們除了從事詩歌、小說及其他藝術創作，同時也要發展海外紅學。胡適稱他們為「第三文藝中心」。早在這時期，周老師就提議用「曹紅學」，因為作者的研究也很重要。顧獻樑說用「曹學」就夠。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寫〈《紅樓夢》考證〉的時候，曾發掘曹雪芹家世許多未為前人注意的材料，次年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稿本和刻

展。見筆者的論文：〈周策縱：學術研究的新典範〉，《世界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2006年10月），頁201-205。

⁴ 周策縱：〈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xix。

⁵ 周策縱：〈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12。

⁶ 同前註，頁13。

本，後來就寫了那篇跋文，這些都是研究曹雪芹的重要材料。胡適和顧頡剛可說是開了「曹學」先河。「曹學」一詞是顧獻樑在一九四〇年代最初提出來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周老師在紐約顧家和顧談起這問題，顧想要用「曹學」這名詞來包括「紅學」。老師提出不如用「曹紅學」來包括二者；分開來說仍可稱作「曹學」和「紅學」。顧還是堅持他的看法。後來顧去了臺灣，一九六三年發表了〈「曹學」創建初議〉一文。

這時（一九五二年開始），大陸批判胡適的新紅學，他們更感到海外紅學研究的重要：

當時我曾和胡先生談起這個問題，他不但不生氣，反而非常開心，向我細說那些人怎樣罵他，……。並且託我代找幾種他未能見到的批判他的資料；也要我繼續探索研究下去。我覺得他這種寬容大度，非常難得。同時便向他提到我認為紅學應從各個角度各種方向去研究的看法：一方面要像他已做過的那樣，用乾、嘉考證，西洋近代科學和漢學的方法去探究事實真相；另一方面要用中外文學理論批評，和比較文學的方法去分析、解釋、和評論小說的本身，這當然應包括從近代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史學、哲學、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統計等各種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的方法與角度去研究。簡單一點說，就是要從多方研究《紅樓夢》。這樣，就不妨容許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或解釋。胡先生雖然對曹雪芹、高鶚、和《紅樓夢》多半已有他固定的看法了，但仍然稱許我這些意見，因為我這樣提倡歡迎各種不同的研究，基本上還符合他生平治學的態度和精神。⁷

老師認為胡適一九二一年寫的〈《紅樓夢》考證〉⁸在閱讀、研究思考方法也是中國文學研究劃時代的典範之作，除了推翻索隱派之外，是新紅學的開始。在著者問題方面，他具體考訂了《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又是「曹學」的開始。胡適雖然支持紅學研究，但他已逐漸放棄，所以老師自己感到有領導與發展紅學研究的使命，這就成為他終生努力的一項學術工作。

⁷ 同前註，頁 14。

⁸ 最早發表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 年）。現胡適所有紅學論文皆收入《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過後，老師在哈佛擔任研究員雖然短暫，也展開他的「《紅樓夢》研究計劃」，但不太成功。到了一九六〇年元旦，唐德剛、顧獻樑、周策縱等一批朋友創辦《海外論壇》月刊時，胡適先生給予支持，這年十一月底就寫了〈所謂「曹雪芹小像」的謎〉，發表在次年元旦出版的《海外論壇》第二卷第一期裏。周老師計劃要在《海外論壇》上繼續胡先生的研究，並擴充王國維(1877-1927)的文學評論方向，再從各個角度去發展新紅學。那時他在哈佛，草擬有一份〈《紅樓夢》研究計劃〉大綱，打算從各種角度對《紅樓夢》做綜合式的研究和檢討。哈佛大學同事中對《紅樓夢》比較有興趣而與老師討論的有海陶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2006) 和楊聯陞 (1914-1990) 教授。海陶瑋英譯過《紅樓夢》前四五回，草稿沒有發表。老師當時在《海外論壇》發表了那篇〈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考之一〉。不幸胡先生不久在一九六二年就去世了，《海外論壇》也停刊了。所以這一批以胡適之先生為首的對紅學有興趣的留美中國學人，沒有能充分發揮作用。

一九六三年初老師到威斯康辛大學任教後，再度推展他的紅學研究計劃。他自己開了專門研究《紅樓夢》的課程，照他以前和胡適、顧頡剛(1893-1980)二先生所說的「多方」研究的觀點去教導學生個別做分析。次年就有學生試用語言學、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方法寫《紅樓夢》分析。有人做了西文翻譯名字對照表；詩人淡瑩（劉寶珍）等協助編了三、四百頁，中英對照的《紅樓夢研究書目》。有一個女生黃傳嘉還首先用統計方式和電腦研究了這小說裏二十多個歎詞和助詞，用來試測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稍後研究生陳炳藻（曾任愛荷華大學教授）用了更複雜的統計公式和電腦計算了二十多萬詞彙的出現頻率，寫成博士論文⁹，分析了《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用字之差異，以判斷作者的問題；結論發現差異不大，不至於出於二人之筆。這論文一直到了一九八〇年才完成與通過，英文版一九八六年由香港三聯出版，中文版《電腦紅學：論紅樓夢作者》遲至一九九六年才由香港三聯出版。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元智大學與清華大學合辦的語言文學與資訊科技國際會議，我們邀請周教授前來做主題演講，就因為在個人電

⁹ "The Authorship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ased on a Computerized Statistical Study of Its Vocabulary" (Ph.D. diss.,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0).

腦還未來臨的時代，他已在威斯康辛大學指導學生採用電腦的數據分析進行語言文學研究¹⁰。

自六十年代上半期起，紅學家趙岡與陳鍾毅來了威大的經濟系，那裏的老師與學生可說對《紅樓夢》發生過相當大的興趣。因此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至二十日在威大召開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一九八六年又在哈爾濱召開第二屆，會合了全世界的紅學專家，實現了周老師繼承胡適與顧頡剛的新紅學研究的理想。首屆會議的四十二篇論文分別代表十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正是「多方」研究的展現：

（一）前人評論檢討，（二）版本與作者問題，（三）後四十回問題，（四）曹雪芹的家世、生活、和著作，（五）主題與結構，（六）心理分析，（七）情節與象徵，（八）比較研究和翻譯，（九）敘述技巧，（十）個性刻劃。¹¹

所以老師說：「從所提出的論文性質來看，可說包括的範圍很廣，觀察的角度頗多。這正是我們籌備人員所盡力提倡和希望的。同時也可說是我們海外紅學界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方向。」¹²

二、結合中國傳統考據學、西方漢學與中國研究的曹紅學

周教授的曹紅學研究，是結合中國傳統考據學、西方漢學與中國研究的產品。在周教授的研究中，特別強調綜合性研究的重要意義。他的「曹紅學」研究，如他的代表作《紅樓夢案》所展現，是多元思考與方法、跨領域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比其他的紅學專家具有更強的洞察力與創見性，他的研究極具首創性。所以瞭解他的曹紅學，有必要知道他的學術思想歷程。

周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離開中國到密西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深精湛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了中國注重版本、目錄、註釋、考據的清代樸學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

¹⁰ 老師於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逝世，這是他生命旅程中最後一次出國遠行及演講。

¹¹ 周策縱：〈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12。

¹² 同前註。

經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說「尤」與蚩尤〉與〈「巫」字探源〉可說是這種治學的代表作¹³。出國後，西方漢學同時加強並突破了這種傳統思考方式，讓他思考中國文化的多元性現象。

《紅樓夢案》中的〈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考之一〉寫於出國初期的一九六一年，是他的《紅樓夢》考之第一篇。他不像一般學者，只停留在「拆字法」玩弄。既有歷史語言的傳統方法，也具有西方文學批評的互文性思考。他把語言、語義與小說情節的發展緊緊結合來解讀，加以詮釋，發現鳳姐的結局並未和這句詩相矛盾，在前八十回已交待清楚。周教授認為，這句冊詞與後四十回情節之間的關係不能用來作為高鹗曾續書的證據¹⁴。

西方傳統漢學強調純粹的學術研究，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過去西方的漢學家，往往窮畢生精力去徹底研究一個小課題，而且是一些冷僻的、業已消失的文化歷史陳跡，和現實毫無相關。因此傳統的漢學研究，研究者不求速效，不問國家大事，所研究的問題沒有現實性與實用法，其研究往往出於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動力是純粹趣味。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¹⁵、《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討論龍山陶文的論文¹⁶，就充分表現「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的西方漢學治學方法與「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紅樓夢案》中的〈紅樓夢「汪恰洋煙」考〉寫於一九六〇年初期，是他發表的《紅樓夢》考之第二篇，考證庚辰脂批本《紅樓夢》小說中晴雯病中用汪恰洋煙通鼻塞的情節。由於老師通曉多種語文，有「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他考訂汪恰洋煙與當時煙草與鼻煙公司 *Virginian tobacco* 有關，汪恰洋煙大概是 *Virginia* 或 *Virgin* 譯音，或是法文 *Vierge* 的譯音。他也在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找到與曹雪芹同時代的，正如晴雯看見的鍍金鼻煙盒，上有瑤黃髮赤身女子像。就如西方漢學家不求速效，很有耐力的研究一個微小問題，這篇短

¹³ 周策縱：《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年）。

¹⁴ 周策縱：〈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考之一〉，《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143-155。

¹⁵ 周策縱：《〈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新加坡：新社出版，1969年）。

¹⁶ 周策縱：〈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山東省鄒平縣丁公村龍山文化陶文考釋〉，《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頁25-46。

文從一九六〇年寫到一九七五年才完成¹⁷。

上述這種漢學傳統在西方還在延續發展。美國學術界自二次大戰以來，已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作中國學 (Chinese Studies)，它與前面的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它很強調中國研究要與現實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要兼備，並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希望達致西方瞭解中國，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瞭解西方¹⁸。中國研究是在區域研究 (Area Studies) 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向主流的。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如性別與文學問題，那是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能單獨顧及和詮釋的。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如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衝擊下的學術大思潮下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¹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中國學」的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的發展，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²⁰，他的代表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²¹的完成與改寫出版都與哈佛的中國學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潮息息相關。他的〈中文單字連寫區分芻議〉發表於一九八七年²²，但早於一九五四年就寫成於哈佛大學。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合中國

¹⁷ 寫作早於〈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考之一〉，但未發表，一九七五年改寫，一九七六年發表。

¹⁸ 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見《十年機緣待儒學：東亞價值再評價》（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3；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及其他論文，見傅偉勳、周陽山編：《西方漢學家論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1-44及其他相關部分。

¹⁹ 同前註，頁1-12。

²⁰ 周教授於一九四八年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一九五〇年獲碩士，一九五五年獲博士。《五四運動史》原為博士論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他在哈佛大學歷史系任訪問學者寫論文，畢業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年又到哈佛任研究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任榮譽研究員。

²¹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²² 羅忼烈主編：《教學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二十週年紀念專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1987年），頁135-152。

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兼備，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精神。另一方面，區域研究思潮也使本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傳統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最權威的著作，成了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潮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的美國「中國學」學者主要從外而內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如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或文化思想，如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只有海陶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但著述不多。這一代哈佛的西方學者，他們的研究（如費正清）從很創新的如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觀點出發，善於利用中外檔案資料，但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識，又不精通古代漢語與古典文獻，更無能力涉及名物訓詁的問題，因此只有周教授能結合中國研究、西方漢學 (Sinology) 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或樸學）去開拓中國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領域，尤其是語言、文字、文化、文學的新領域。周教授的〈玉璽・婚姻・《紅樓夢》——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援用文物、碑文、歷史檔案，揭開曹家的歷史與社會背景，為瞭解小說與西方當代性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²³。

周教授的曹紅學給了索隱派一個很大的打擊。

三、《紅樓夢案》的曹紅學：詮釋學、文學解讀的典範

周老師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了《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這是老師終生曹紅學的研究最具體的代表作。他在序文裏說：「我這個集子所收的論文，牽涉《紅樓夢》研究的方面頗廣，但主要的還在於考證、文論、和版本校勘幾個領域。在考證方面，我最受鼓勵和影響的，前有顧頡剛先生，後有胡適之先生。」老師一生都忙於提倡而疏於著述，所以他還是感嘆成果太少：「我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本來定有比較頗具系統的完整計劃，可是一直未能實現。我過去編有中英對照的《紅樓夢研究書目》，稿件三、四百頁，只因求全責備之心太切，一直未克出版。現在檢閱這冊菲薄的成績，真不免『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

²³ 周策縱：〈玉璽・婚姻・《紅樓夢》——曹雪芹家世政治關係溯源〉，《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253-286。

也！」²⁴

「紅學」這名詞在一八七五年已流行使用，主要以評點、題詠、索隱為主。胡適在一九二一年發表〈《紅樓夢》考證〉，以校勘、訓詁、考據來研究《紅樓夢》，被認為是「新紅學」的開始。而周策縱老師從一九五〇年起提出以「曹紅學」來稱呼他的《紅樓夢》及其作者的研究，繼承了顧頡剛、胡適、王國維等人的「新紅學」，加上西方漢學嚴謹的態度與對古典文獻縝密的考證精神、西方社會科學多元的觀點與方法，在考證、文學分析和版本校勘幾個領域開拓了新天地，同時也把語言學、文學批評、比較文學、電腦科技帶進曹紅學的研究視野中。

很明顯地，周老師的紅學研究，在方法上，一方面繼承中國的紅學學術傳統並發揚西方的學術思想與方法，如上所述，建立「多方」研討；同時在目的上，他深受當時美國「中國研究」所強調的「挑戰與回應」理論的影響，就是研究與現實有相關的課題，思想性與實用性兼備²⁵。《紅樓夢案》前四篇論文都是強調研究曹紅學應有學術的思考精神與方法，還要建立《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文學目的，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老師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整個學術研究，可能形成一個詮釋學的典範，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他深惡痛絕長期以來以訛傳訛，以誤證誤，使人浪費無比精力的態度和方法²⁶。他主張發掘到的新資料應該普遍公開。他舉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寫〈《紅樓夢》考證〉，其考證根據的重要資料《四松堂集》卻保密了三十年才公開；另外他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讓別人利用。又例如早年周汝昌主張脂硯齋就是史湘雲，並不是沒有能力看見別人反對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對自己²⁷。

本文前面提到老師曾向顧頡剛與胡適提到紅學應從各個角度、各種方向去研究的看法：一方面要「用乾、嘉考證，西洋近代科學和漢學的方法去探究事實真相；

²⁴ 周策縱：〈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同前註，頁 xix。

²⁵ 「挑戰與回應」理論出自湯因比 (A. J. Toynbee, 1889-1975) 的十大冊 *A Study of History* (1934-54)，像哈佛的費正清的中國研究，便是以這模式來解讀中國，一方面研究中國如何回應西方，同時讓西方了解中國。

²⁶ 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1-10。

²⁷ 同前註，頁 2-5。

另一方面要用中外文學理論批評，和比較文學的方法去分析、解釋和評論小說的本身，這當然應包括從近代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史學、哲學、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統計等各種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甚至自然科學的方法與角度去研究」²⁸。但老師始終覺得可惜，過去紅學家很少有人深刻研究過中外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所以《紅樓夢案》研究紅學的最終目的，是瞭解《紅樓夢》作為文學小說的藝術及其價值。老師自己從事文學創作，又精通古今中外的文學及理論，他的紅學突破了許多傳統的觀點與認識，一切都是為了回歸文學，不是為考證而考證。

今天紅學完全忽視詠《紅》詩，周教授卻注意到《紅樓夢》讀者的題詠，具有今日西方流行的讀者反應批評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的價值，這由於他自己在中學時代就寫詠《紅》舊詩，更進而思考《紅樓夢》的題詠詩，認為作為批評的一種形式雖舊，卻也是被忽略的一種屬於讀者批評的文學批評：

「新紅學」也不重視題詠。可是《紅樓夢》裏的詩、詞、曲子卻特別多，過去兩百多年，《紅樓夢》讀者題詠之作，比起別的任何主要小說所能引起的都多。這也可算是這部小說的特徵之一。這個現象也許還值得注意和研究。尤其近代西洋比較文學升起後，「讀者回應說」(Readers' Response Theory) 頗風行一時。本來，對任何文學作品的評價，都不能脫離讀者回應，因為評論者和文學史家本身也就是讀者。題詠當然也是讀者回應之一，也許還更能表達較微妙的回應。我當然不是說，題詠可以取代紅學中考證、文論、評點等主流。我只是要指出：題詠在紅學中自有它特殊的作用；這作用在紅學中卻比較重要，也許需要一番重新認識。²⁹

關於《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作者是否為曹雪芹與高鶚的爭論，周教授始終反對後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的簡單結論。根據不可靠的考據，將著作權給予高鶚，如目前很多《紅樓夢》，封面竟印成「曹雪芹、高鶚著」，實在不妥。他先後用兩種科學的方法來尋求答案。他是世界上最早採用電腦來分析小說的詞彙出現頻率，來鑑定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作者的異同的學者。他曾指導研究生黃傳嘉用電腦分析了二十多個數詞助詞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異同，後來又指導上述陳炳藻

²⁸ 周策縱：〈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同前註，頁14。

²⁹ 周策縱：〈自序：「白頭海外說《紅樓》」〉，同前註，頁 xviii。

用更複雜的統計公式和電腦計算二十多萬詞彙的出現頻率，寫成博士論文。兩次的分析結果顯示，前後的差異不大，沒有出於兩人的文筆跡象。

另外周教授又根據清代木刻印刷術出版一本書籍的實際作業流程，來考驗從對詩詞中的一兩個字臆測出來的結論的可靠性。根據文獻，程偉元出示書稿到續書印刷出版，只花了十個月左右；根據當時可靠的刻印書作業時間，單單刻印，最快至少要六個月，其實私家印書，字模設備難全，可能更慢：

他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的春天才得由程偉元出示書稿，到同年冬至後五日（這年陰曆十一月二十七日，即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後五日即陽曆十二月二十七日），工竣作序，這中間只有十來個月的時間。照當時武英殿排活字版的速度，印三百二十部書的正常作業，每十天只能擺書一百二十版，《紅樓夢》約有七十五萬字左右，共一千五百七十五葉（版），至少需要一百三十一天纔能排印完，這已是四個半月了。私家印書，字模設備難全，人手不夠，都有可能，條件恐怕趕不上武英殿，而且草創初版，正如程、高再版〈引言〉中所說的：「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估計總得六個月才能印好。³⁰

這樣高鶚只有四個月，如何續書四十回？《紅樓夢》情節複雜，千頭萬緒，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人。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寫了八十回，高鶚在四個月完成續書四十回，怎麼可能？對文學創作有認識的人都不會相信高鶚在短期間可能寫出四十回。更何況現在學者已發現，在程甲本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如《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高鶚修改時可能用過其殘稿作底本³¹。

周教授為政治學博士出身，以社會科學、歷史學治學方法與精神主導其資料分析，講究事實證據、客觀史學，始終嚴格監控著紅學界望文生義的憑臆測、空疏的解讀。他的校勘、訓詁、考證的功夫高強，又具備客觀的史學訓練，使他很清醒地看待胡適及後來的學者。對清代一首舊詩中的注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的「補」字的含義，他認為這不是「補作」（即續書），只是修補：

³⁰ 周策縱：〈《紅樓》三問——《紅樓夢大觀：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選》序〉，同前註，頁25。

³¹ 同前註，頁24-30。

胡適很相信張問陶〈贈高蘭墅鶚同年〉詩中自注的話：「《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認為「補」就是「補作」，不止是「修補」。又把高鶚所寫的〈引言〉第六條：「是書開卷略誌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解釋作「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纔記上這一條。我以為這都是誤解，其實高鶚說的「聊以記成書之幸」正「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可見所謂「補」正是「修補」，也就是程偉元序中說的「乃同友人〔高鶚〕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中「補短」的「補」。³²

由於紅學家多數沒有受過純文學的訓練，他們多是一批有考古癖的人，總是用文獻價值來對待文學，以為時間較早的脂批本更有價值，所以近年出版新校本，就把八十回的脂批本代替了程、高的排印本，理由是初稿應更接近作者的原意。懂得文學創作的人，都知道作家通常都以最後改定稿為定本。所以周老師對時下紅學界很失望：

作者後改定的稿子有時也不一定勝於前稿。不過後來的改定稿至少表示那是作者經過考慮後他自以為是較好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說稿子越早的越好。可是這些年來，我們一方面還很少能判斷那一個版本在先，那一個在後，尤其是其間的明確繼承關係往往還弄不清，卻大致憑臆測，儘量採用我們認為較早的版本，而且總以為過錄的抄本較可靠。³³

周老師以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俞平伯先生校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和該社一九八二年中國藝術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的《紅樓夢》（兩本都以脂本作底本，前者用有正本，後者用庚辰本）與傳統流通本（程高本）比較，篇幅相差無幾，但前者的文字不通之處甚多。他指出：「程、高早就交代過，他們是『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是『廣集核勘』過的。我們實無充分證據來否認他們這些話。」³⁴

³² 周策縱：〈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同前註，頁 40。

³³ 周策縱：〈《紅樓》三問——《紅樓夢大觀：哈爾濱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序〉，同前註，頁 31-32。

³⁴ 同前註，頁 31。

四、從外而內的校勘考證：從曹紅學進入 《紅樓夢》的小說藝術結構

周老師的紅學研究與多數其他紅學家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不管在校勘、訓詁、考證，都不忘記他在處理一部文學作品，這是一部小說。他的紅學考證，處處都反映出他對小說技巧、理論與批評的熟悉。上面提到他從詠《紅》詩開始研究，現在的新紅學家完全忽視這些作品，而他從讀者批評的觀點看問題，覺得還是具有研讀的意義。我們閱讀〈《紅樓夢》本旨試說〉，驚訝他對《紅樓夢》中小說技巧與結構分析之深入：

前五回只在總敘作者的主旨和小說的架構，與介紹重要小說人物和中心思想。一直要到第六回描寫寶玉與襲人的特殊關係和劉姥姥一進大觀園，纔一步一步展開故事本身的實際敘述。

像這樣把整個前五回來總敘作者主旨和小說架構，並介紹重要小說人物和小說的中心思想，籠罩全局，突出主題，這在中國及世界小說史上都現得是很獨特的。固然如《西遊記》前面的十多回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替主題和主要人物作預備工作，可是遠不如《紅樓夢》前五回那樣有完整、複雜、微妙，而多層的設計……但這正是《紅樓夢》特異之處，也正密扣著此書的主旨。³⁵

接下去論析《紅樓夢》「多種『觀察點』——貫通個性與共性」，從考證大師，周老師搖身一變，完全成為一位論述小說的藝術大師，對小說大師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佛斯特 (E. M. Forster, 1879-1970) 或理論家魯博 (Percy Lubbock)、伯特 (Wayne Booth) 等的小说技巧與理論無所不懂³⁶，因此周老師能夠透視《紅樓夢》敘述結構的奧秘：

首先我們要了解，《紅樓夢》之所以優異動人而有遠大的影響，是它能貫通

³⁵ 周策縱：〈《紅樓夢》「本旨」試說〉，同前註，頁 69-70。

³⁶ Henry James, *The Art of the Nove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8); E. M. 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54); Joseph Conrad, "Preface to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in *Myth and Method: Modern Theories of Fic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0); Percy Lubbock, *The Craft of Fiction* (New York: Peter Smith, 1945);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作品所述社會人生的個性和共性，就是使讀者覺得書中所描述的人與事，一方面如真有發生，即明知是虛設的，卻栩栩欲活，各有個性而獨一無二；另一方面卻又覺得這種人與事，在讀者週圍，也到處可以以相同的或不同的方式出現或找到。書中所寫雖是一時一地的人與事，甚至如所宣稱的只是作者一生親見親聞之人與事，但背後卻似乎又說了古往今來甚至未來人生的命運。而又使讀者不覺這些乃是空洞的說教。

《紅樓夢》的作者爲了要做到這點，採取了好些巧妙的手法。其中之一便牽涉到如近代西洋小說批評中時常提到的小說的「觀察點」問題。（我把 point-of-view 不照一般習慣譯作「觀點」，因爲通常所謂「觀點」乃指思想上一種看法，小說批評理論中所說的 point-of-view 有時雖也含有此義，但有時則不必，而只是指說者或觀察者站在甚麼地位，或是那一種人而已……。）一般小說的作者所能設想的觀察點不外於五六種……。

《紅樓夢》「小說人物」的觀察點，各各顧到，某人從某種地位、立場，和思想感情觀點看問題，行事，說話，各自有條理不亂，聞聲見影，即知是誰人，這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實，不必在此列舉例證。³⁷

但是周老師指出，除了西洋小說常出現的那些多知或第一人稱等多種觀察點之外，《紅樓夢》中還有一種觀察點為人所不知，西方小說不見有使用：

《紅樓夢》在處理觀察點方面，有一個更複雜的安排，則是對故事敘述者、背後作者、和實際血肉作者三者的交互微妙處理。所謂背後作者與實際作者，如〈凡例〉中引「作者自云」，又說「自云」，或「作者本意」，便是以背後作者來引述實際作者……。³⁸

老師有閱讀《紅樓夢》詩曰：「一生百讀《紅樓夢》，借問如何趣益濃？只為書中原有我，親聞親見更親逢。」³⁹ 他自己從現代小說的參與論加以解釋：

能親聞、親見，固然已不尋常，但這還只算旁觀者；我現在加個「親逢」，逢即逢遇、遭逢之意，也就是《紅樓夢》第一回說的「親自經歷」的意思。表示讀者有如親身參與經歷了書中的事件，這就更直接親切，非同小可了。

³⁷ 周策縱：〈《紅樓夢》「本旨」試說〉，《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70-71。

³⁸ 同前註，頁 71-72。

³⁹ 周策縱：〈書中有我讀《紅樓》——「《紅樓夢》研究叢書」總序〉，同前註，頁 190。

《紅樓夢》之所以能做到這點，使讀者認同，除了上文提到的描寫情景逼真而不隔，含有無盡的言外之意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它是中國第一部自傳式的言情小說。⁴⁰

周老師的詮釋使我馬上想起康拉德所說過的，小說家應具有使讀者「親聞親見更親逢」這樣的力量：

My task which I am trying to achieve is, by 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to make you hear, to make you feel—it is, before all, to make you see. That—and no more, and it is everything.⁴¹

小說家的工作是努力通過書寫的力量要讓你聽到、感受到，更重要的使你看到。這就是小說要達到的最高境界，周教授進一步看到小說中的參與感與多義性，因此他從讀者批評的閱讀理論來看《紅樓夢》：

《紅樓夢》的這種自傳性，自然還不是成功的充足條件；更緊要的是它能使讀者時時有參與感和親切感，使每個讀者把自己也讀了進去，就較易造成另外一種效果，那就是我前文開頭說過的，讀者和研究者結論各有不同，爭論不休。因為每個讀者，每個評論者，每個研究者，原有他或她自己的不同身世、思想、感情，以至於不同的分析、解釋、和批評理論與方法，如今把自己放進去，也就是把這種種不同因素加上去，大家對《紅樓夢》的看法，自然就更有差異，而很難求同了。⁴²

文學作品可分為單一意義的作品 (rhetorical presentation)，其主題意義強加於讀者的作品，另一種是多種意義的作品 (dialectical presentation)，讀者有參與感，意義要讀者自己去尋找。《紅樓夢》便是後一種。「讀者反應」的閱讀者在閱讀時，是帶著自己本土文化經驗、個人的與民族的感情思想，甚至幻想力去閱讀，去瞭解。閱讀者是決定意義的最重要因素。周教授是一位對文學的語言技巧、藝術結構有訓練，所謂有學問的讀者 (informed reader, competent reader, educated reader)⁴³。

⁴⁰ 同前註。

⁴¹ Joseph Conrad, "Preface to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p. 30.

⁴² 周策縱：〈書中有我讀《紅樓》——「《紅樓夢》研究叢書」總序〉，《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 191。

⁴³ Elizabeth Freund,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New York: Methuen, 1987)；中譯本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 年）。

五、結論：給《紅樓夢》學術帶來 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

在《紅樓夢案》的文章中，尤其〈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一文，老師多次的肯定胡適在《紅樓夢》版本學後人無法超越的貢獻，除了紅學，同時又開了曹學研究先河。他特別指出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寫的三篇文章⁴⁴，他說至今「還沒有一人超過胡適在《紅樓夢》版本學方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貢獻」⁴⁵。他明白的指出，後來學者的研究，包括他自己的，都是在胡適完成的研究與影響或籠罩之下展開的。在《紅樓夢案》的序文中，周教授也承認「在考證方面，我最受鼓勵和影響的，前有顧頡剛先生，後有胡適之先生」。至於談到《紅樓夢案》的研究，他說：「我這個集子所收的論文，牽涉《紅樓夢》研究的方面頗廣，但主要的還在於考證、文論、和版本校勘幾個領域。」可見周老師似乎很含蓄地自我意識到，除了考證版本，他在曹紅學中，他的文論最具有突破性的表現。我在上面已引述他對於為了滿足歷史癖和考據癖的紅學的不滿，當然他對胡適的考證止於考證也很失望，尤其胡適晚年尚有貶低《紅樓夢》、令人不能接受的藝術評價⁴⁶。他自己則是從外而內，用考證訓詁與版本學建構出一個欣賞、分析、評價《紅樓夢》藝術世界的批評架構與理論：

從胡適之先生以來，他們一批朋友又多半有點歷史癖和考據癖；當然，無論對這小說怎樣分析、解釋、與評估，總得以事實做根據，所以對事實考證就看得特別重要了。我也很同意這種看法，但同時覺得可惜過去紅學家很少有人深刻研究過中外的文學理論與批評。⁴⁷

周教授認為最大遺憾，就是「紅學家很少有人深刻研究過中外的文學理論與批評」。這本《紅樓夢案》，除了開啟了「多方」研究紅學與曹學的學術方法外，如

⁴⁴ 一九二一年〈《紅樓夢》考證〉、一九二七年〈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及一九三三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

⁴⁵ 周策縱：〈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頁47。

⁴⁶ 同前註，頁61-66。

⁴⁷ 周策縱：〈多方研討《紅樓夢》——《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者序〉，同前註，頁12。

上所述，還結合了中國傳統考據學、西方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學術精神與方法，將是教導年輕學者「治學方法」最好的範本。他把考證版本回歸文學研究，給《紅樓夢》的小說藝術世界帶來深度的文學分析 (literary analysis)。周教授的三篇文章：〈《紅樓》三問〉、〈《紅樓夢》「本旨」試說〉及〈書中有我讀《紅樓》〉，是新紅學家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的劃時代之作。周教授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結合成一體，展示著跨國界的文化視野，給《紅樓夢》學術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⁴⁸。

⁴⁸ 當然，近幾十年，西方的學者出版了許多傑出的文學分析的文論，但是他們不是建立在新紅學的基礎上的著作，屬於另一類的紅學研究，本人並沒有忽視其成就。